

# 从语言研究看学派意识<sup>\*</sup>

## ——谈准备学派土壤需要摆正的几种关系

霍永寿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州 510420)

**提 要:**本文是对钱冠连(2004, 2007)关于语言研究中学派意识和学派问题系列文章的进一步讨论。文章认为,学派的创生与成长需要社会大环境与学科小环境,更需要坚实的学术土壤。就学科小环境而言,作者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准备学派土壤、培养学派意识须要摆正4种关系:语言事实与哲学眼光、引进与创新、大海与刺猬以及汉语界与外语界。

**关键词:**语言研究;学派意识;关系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09)05-0015-5

### School Awareness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Relations to Be Balanced for the Emergence of Schools of Linguistics in China

Huo Yong-shou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Predicated on Qian's (2004; 2007) papers on school awareness in linguistic studies in China,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s in linguistics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a calls for a macro soci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a micro disciplinary environment, especially a sou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maintains that to develop school awareness in the current linguistic studies in China, four relations, i.e. relations between language facts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relations between introduction and creation, relations between the ocean and the hedgehog style of theorization and relations between studies of Chinese and studies of foreign languages, have to be well balanced.

**Key words:** linguistic studies; school awareness; relations

#### 1 引言

钱冠连教授的论文《以学派意识看汉语研究》(《汉语学报》2004年第2期)和《以学派意识看外语研究——学派问题上的心理障碍》(《中国外语》2007年第1期)回顾国内语言研究的历史,对语言研究有学术无学派的状况作了客观、理性、全面的分析,并对改变目前局面提出中肯而又切实可行的建议,读来令人有任重道远之感。

钱先生认为,“学派是学术研究领域走向成熟、发达、繁荣的标志。形成学派的主要标志,窃以为是:有代表人物(领军人物)、有成员(以更入行的话说便是“有核心成员及追随者或支持者”)、有代表作、数得出主要贡献(在理论上解决了什么重大问题)、有主要学术套路及独特的研究风格”(钱冠连 2004: 2)。

学派的创生与成长需要社会大环境与学科小环境,更需要坚实的学术土壤。本文以钱先生对学派的理解为

基础,讨论在目前的情况下准备学派土壤须要摆正的4种关系。

#### 2 语言事实与哲学眼光

在回顾国内汉语研究百年史时,钱先生谈到百年来国内汉语研究存在一个明显的理论倾向:重视对语言事实的微观分析,忽视宏观语言理论的建构。方法论上的具体表现就是重视对语言事实的发掘和归纳,忽视归纳基础上的演绎和语言理论建构。理论导向上的局限和方法论上的欠缺是导致有学术无学派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

应该说,作为一门经验性或实证性的学科,语言研究重视对语言事实的发掘、收集,在研究过程中重视对语言事实的归纳,是学科发展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是语言学研究人员培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但问题是,基础并不是全部,更不是学科研究的根本目的。在西方哲学和语言

\* 本文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学界,以归纳法为取向的逻辑实证主义或彻底的经验主义(如盛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维也纳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曾经盛极一时,但很快就因其方法论上的严重缺陷而受到批判,并为以演绎法为取向的证伪论和生成语言学所取代。回顾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语言学界生机勃勃,学派、理论异彩纷呈的局面,恐怕谁都得承认这一局面的产生和发展与演绎法在语言研究中的主导性有密切关系。而首次把演绎法作为语言学研究主导方法的正是敢于打破结构主义一统天下的乔姆斯基。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是语言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其结果是出现一系列介于语言学与其他学科间的交叉学科。交叉学科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至少说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语言的问题绝不能只归结为语言问题,它和语言使用者的本质以及其他相关现象有密切的关系。这样一来,把语言研究的目的定位于对语言事实的解释显然远远不够。语言研究的目标应该是也必须是,对人的本质及人的生命和生存形式的解释。要达到这一目的,仅仅把研究视角局限于有限的语言事实,仅仅把研究目标定位于对语言事实的解释(有多少事实说多少话),远远不够。更需要同时也是更重要的是基于一定事实、在一定科学范式内的大胆演绎、假设和证伪。换言之,语言研究要用哲学的眼光介入语言事实观察。

奥托·叶斯柏森在其语法名著《语法哲学》中引用卢梭的名言“即使对司空见惯的事物进行观察,也需要具有哲学的头脑”(叶斯柏森 1988: 1)。这里,可以不谈卢梭这句话的哲学含义,但也许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叶斯柏森把这句话置于该书序言标题之下,这或许可以说明此书自1924年初版至今畅销八十余年而不衰的真正原因。

那么,哲学眼光对语言研究有何作用?曾经有一位外语界学者对笔者坦诚相告:我对哲学不感兴趣,我只想搞清楚语言中句法和语义之间的关系。但据笔者所知,对上述两种现象关系的探讨一直都得到哲学家,更为确切地说,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如希尔伯特、哥德尔的关注,已取得巨大的、可资借鉴的成就。这样一来,执意抛开哲学谈语言问题,势必会进入死胡同而不知。

笔者以为,哲学眼光对语言研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哲学眼光有助于发现语言事实。语言事实固然客观存在,但作为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对语言科学的研究并无用处。真正有用的语言事实是研究者根据研究的需要去收集、整理的语言材料。这里,研究的需要所反映的便是一种哲学的眼光。只有从一种哲学眼光出发,客观的语言事实才能成为与某一研究相关、真正有用的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事实不但是发现的,甚至还可以是发明的。离开了哲学层面上的学科理论建构的需要,语言事实是无用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存在

的。正如一个学科的元陈述不在本学科一样,一个学科(包括语言科学)的生长点也不在本学科内,而存在于更高一个层面上。这个层面便是哲学。只有在这个层面上,语言事实才可以变活、变得有用。

哲学眼光有助于分析语言事实。语言研究肯定要分析语言事实,但问题是如何分析语言事实。对于语言科学而言,哲学提供的是一种从理论上介入分析对象(语言事实)的视角和科学方法。考察科学发展史,会发现,学科研究中形成流派的基础便是一种观察和分析事实的方法。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哲学眼光,便会形成什么样的学派。甚至,还存在这样的情形,即哲学眼光的高低可以决定据此形成的学派规模。开阔的哲学视野势必能形成影响深远的大学派,而狭隘的眼光则只会形成小学派。语言理论的建构固然离不开语言事实,但语言理论体系的建构乃至语言理论的规模却是由研究者的哲学视野或眼光决定的。

与此相关的是,哲学眼光有助于形成系统化的语言理论(学派标志),并使理论与事实随时保持一定的距离。何以如此?哲学眼光对于语言研究(甚至可以说任何具体学科的研究)的重要作用在于它使研究者不把自己的研究完全局限于语言事实的分析(虽然如上所言,这样的分析是必要的),而是按照哲学提供的学科研究范式对分析结果进行理论层面的提升。从科学发展史来看,一种理论只有靠近人类知识体系的核心部位(哲学;就语言科学而言,普通语言学)才能处于学科研究兴趣的热点地带,才不会被学科知识发展的离心力甩出体系,也才不会被人们所遗忘。这样的理论虽然与事实有关联,但却更多表现为研究者在哲学层面上的思辨和建构,因而无法还原为事实。一切用事实说话虽然符合人们关于知识获得的直觉,但在科学研究中也会发现,一个真正有解释力或预测能力的理论往往是离开实践、和事实保持一段距离的理论。语言理论也不例外。

那么,完全贴近事实(生活)的学术研究是什么情形呢?李济论及中国古器物学800年(自11世纪起)发展史时说,“而古器物学八百年来在中国所以未能前进,就是因为没有走上纯理智的这条路。随着半艺术的治学态度,‘古器物’就化为‘古玩’,‘题跋’代替了‘考订’,‘欣赏’掩盖了‘了解’”(李济 1990: 60 - 61)。“这八百年的工作,好像在填紧的泥塘上,建筑了一所崇大的庙宇似的;设计、材料、人工,都是上选;不过,忘记了计算地基的负荷力,这座建筑,在不久的时间,就显着倾斜、卷折、罅漏,不能持久地站住。”(扬之水 2004: 39 - 40)一门学科有上好的材料、优秀的研究者,却800年无进展。缺了什么?缺的是哲学(纯理智的研究)对学科研究的支撑、提升和牵引。今天的语言研究当然不会是这样的情形,但反思这段历史,吸取古人的教训却是必要的。

而相反的情形是什么?西方的自然科学在西方哲学认识论转向的基础上只经过了短短三百年左右的时间就建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然科学学科体系。几乎与此同时,洛克的语言转向开启了语言研究的两条路子(Losonsky 2006),并经过孔狄亚克、莱布尼茨、洪堡特、穆勒、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的发展迅速形成了20世纪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从而促成了西方20世纪语言研究的繁荣景象。细考今日西方语言学的重要流派,哪一派没有自己的哲学基础?这一点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 3 引进与创新

如上所言,20世纪西方语言学在认识论转向后的语言哲学支撑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当今西方语言学流派林立、理论创新层出不穷便是最好的明证。而考察国内的研究状况,我们会发现,冷战时期的闭关自守以及“文革”时期的闭门苦斗对学科研究造成的伤害更是加大了国内语言学研究与西方语言学的差距。这样,向西方人学习、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必然成为国内语言学研究(尤其是外语语言学者)的重要任务。任何拒斥西方语言学理论、另起炉灶的作法都有可能招致理论研究的落后,从而影响国内语言学的健康发展。

但过分重视引进的重要性从而导致引进与创新关系的失衡同样是有害的。可以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科学研究的第一要务都是创新,都是创立前人没有提出的理论。引进虽然重要,尤其在当前情况下,引进和吸收西方先进的语言学理论确实可以尽快缩小国内外语言学研究之间的差距,但是引进和吸收无论多么重要,都不能代替自己的理论创造。从任何意义上说,引进和吸收的目的都只能有一个:原创性的理论生产。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学科的学术研究有“活水”源头,才能造就民族的学术体系。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给科技界的启示是,市场换技术最终是既无市场,也无技术,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买卖。语言学界当引以为戒。

创新研究和创新理论会不会自然出现?回答是:不会。创新观念和意识必须在引进之初就树立起来。只有一开始就以我为主,找到自己的真问题,引进和吸收才能有所依归,有所指向。叔本华关于哲学和教育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引述如下:“且书籍之与人以一定之思想也,较直观之世界为甚。何则?直观之世界不过与思想之材料与机括,于其思索之及方向,毫不阻害之故也。故读书太多者必失其精神之凹凸力,与弹跳之疲于重量而失其凹凸力无异。未无思想之创造者,或以读书自便耳。此学者之所以常愚,而其著述不能成功者也。仆析之言曰:“久读者者,不为人所读”。此之谓也”(佛雏 2006: 187)。如果把读书看作引进和吸收,那么过分重视引进

与吸收是否也会使读书者逐渐“失其精神之凹凸力”,从而“不为人所读”呢?可见,引进和吸收中不可能自然生发出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原创性思想和理论来自于研究者以我为主的创新意识。

仅仅靠追赶西方先进的语言学理论能否导致真正原创性的成果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已在前面给出了。追赶的问题属于引进和吸收的问题,与创新并无直接关系。追赶只能缩短国内语言研究与西方语言学之间的距离,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内语言学落后的现实。这即是说,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内语言学的研究状况(有学术无学派),只能走自主创新的学术研究之路。

那么,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国内语言研究怎样走上自主创新之路呢?既然自主创新不是退步、不是拒斥西方语言学理论,那么为何不以西方语言研究为基础,开展自主创新的语言学研究呢?实际上,类似的研究在国内早就开始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哲学界的科玄之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金岳霖、冯友兰、熊伟等以对当时国际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维也纳学派哲学理论的理解、吸收为出发点,以中国哲学传统问题(如形上学研究)为依托,通过与国外哲学家的对话、交流和讨论,逐步形成独具特色且有世界哲学档次的哲学研究问题。同时,在讨论乃至于争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国内哲学界逐步形成了观点各异的哲学流派(如清华学派)。值得注意的是,从引进和讨论西方哲学的问题到以中国传统哲学为基础提出解决西方哲学问题的办法,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术流派,哲学家们只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考虑到当时的学术环境(资料匮乏、经费不足、社会和政治的动荡),我们更应该珍视这段历史和经验。

语言学界又如何呢?如果我们接受钱先生的说法,把以吕叔湘为代表的语言研究路向称为“实证派”,那么可以说,钱先生文中提到的“实证派”形成于上世纪40年代,是我国老一代语言学家根据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在深入了解和研究美国描写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分析汉语语言特点而形成的语言学流派。外语界的语言学研究,钱先生本人所倡导的“借窝生蛋”和“自筑窝自生蛋”的作法也不失为切合现实的致思之路。“借窝生蛋”时,“窝”(理论)是别人的,而“蛋”(研究结果)则是自己的。从“借窝生蛋”到“自筑窝自生蛋”,是从引进、吸收到自主创新的路子。在这个过程中,研究的自主性体现为研究问题、研究课题的自主性。

### 4 大海与刺猬

本文所论的“大海”和“刺猬”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致思方式和研究风格。“大海”所代表的是这样一种致思方式,即研究者对他人、前人的理论不是采取拒斥的态度,而是兼容并包,此所谓“海纳百川,其容乃大”。这种致思

方式的结果是学问越大,包容的学说、思想就越多。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在学术研究方法上的体现。

不同的是“刺猬”式的研究风格。它的一个明显特征是研究者对他人的、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始终持一种批评、拒绝中庸式调和乃至至于拒斥的态度。这是典型的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学术研究风格。

在此,我们无意讨论上述学术研究风格的优劣,但从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来说,“刺猬”式的研究风格似乎更有优势。何以如此?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9年修订版)把学派定义为“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的不同而形成的派别”。这个定义揭示了学派形成的一个重要前提:学派都有自己独特的、不同于其他学派的学说和观点。更进一步说,什么是学说呢?学说指“学术上有系统的主张或见解”(同上)。显然,除了上述钱先生的描述外,学派靠的是独特的而且是成体系或系统的学术主张或见解而立身处世。

成体系的理论一般有三个特点:内部一致性;排斥其他理论;排斥与其相悖的事实。科学的一致性原则要求一种成体系的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必须保持绝对的连贯性和统一性。一种理论之所以成体系是因为该理论各组成部分之间不存在矛盾。其实,从某一个逻辑出发点演绎推导出来的理论就能满足这个要求。而从经验出发建立的理论就很难满足这一要求,因为人类思维在经验层面是可以容忍、包容矛盾的。

与此相关的是,理论体系的排他性要求一种理论和另外一种理论之间存在不相容性。世界是复杂的,而解释世界的理论却是单一的。理论体系的这种单一(一致性)把理论原来的异质性推到理论体系的边界处,使不同的理论体系在保持内部一致性的同时也在相互的边界处保有或多或少的不相容性,甚至是矛盾。这是理论体系存在的价值所在。

此外,成体系的理论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排斥与其相悖的事实。如前所述,语言事实虽然客观存在,但是纯然客观的事实对具体的研究是无用的。真正有用的语言事实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建构以及检验的需要去发现、整理获得的材料。如此说来,发现、整理的过程既是找出符合自己需要的语言事实的过程,也是去除那些与自己的需要不相符合乃至于相悖的事实的过程。一种有所为的理论体系同时也是有所不为的理论体系。这样,某一理论体系对与其不相容的语言事实的排斥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它符合哲学对科学理论的要求。

显然,“刺猬”式的致思路径更加适合理论体系建构的需要。它有助于研究者找到研究问题,以此为基础用最快速度建立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想一想我们经常引

用的那些西方语言学大家年纪轻轻就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成为学派的领军人物,我们作何感想?

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明白钱先生关于“汉语研究中的学派的形势不明朗”的论点了。一个学术群体之所以能够成其为一个学派,是因为这个群体建构了独具特色的、自成体系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来自于“刺猬”式的致思路径。而不同的学派或学术群体为了彰显和维护自己的学术主张,也只能对其他学派或群体的观点采取不同程度的拒斥态度。“刺猬精神”是学派产生和存在的基础。这样,某一学科“学派的形势不明朗”恐怕是因为该学科的研究者们缺少“刺猬精神”吧。

为了使我国的语言学研究真正走向世界,让我们多一点“刺猬”,也多一点对“刺猬精神”的宽容与理解吧。

## 5 汉语界与外语界

钱先生把形成学派的主要标志概括为“有代表人物(领军人物)、有成员(以更入行的话说便是“有核心成员及追随者或支持者”)、有代表作、数得出主要贡献(在理论上解决了什么重大问题)、有主要学术套路及独特的研究风格”(钱冠连 2004)。钱先生的概括涉及到形成学派的一个重要前提:学派内部人员的组织问题,即“有核心成员及追随者或支持者”。笔者认为,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作为学派产生的土壤的学术社区及其学术文化的建设问题。

Collins曾经在考察世界范围内学术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关于知识的传承和创新的解释模型(陈心想 2004: 132)。Collins的模型包括两种理论:互动仪式链理论和网络结构理论。前者认为,知识有效传承和创新的条件是知识分子要有自己的社区,而且在自己的社区中知识分子还要有一套自己的互动仪式。这里,知识分子的反思本身决定自己思想观念的有效性。他们有自己的术语和行话、自己的写作规范,还有学者之间面对面的交流。Collins认为,只有学者间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才能把社区的文化资本代代相传,并同时激发同辈或后辈学者的情感能量。这样,就需要在知识分子间建立一种网络关系。

网络结构理论认为,个人思想观念的提出和发展是在这样一种典型的社会模式运作下发生的:既有论友又有论敌的知识分子群体。Collins以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宋代新儒学兴起的历史论证并表明,互动仪式链和网络结构对于构成学术社区以保证知识的传承和创新至关重要。这样一个社区不但要不断吸纳新人,还要给他们不断输入创新的能量,并将其置于思想脉络富有成果的工作面前,然后让其去打开局面。

学术社区的存在为学者间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了条件和平台。这里,无论是论友还是论敌都可以交流和对话,

而新的思想和观念就是在这种交流和对话过程中萌发和成长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学者被筛选出来成为学派的代表人物,而其他的学者则按其成就的大小分布在社区网络结构的不同层面上。

学术社区的存在还为学派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学术文化氛围。如果我们承认,文化既是一种精神又是一种活动方式,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学术文化既体现为一种学术精神,也体现为一种学术活动方式。而这种精神和活动方式都来自并运作于上述网络结构。这样,可以说一个健康的学术社区的标志是有一个健康的学术文化。健康的学术文化为学派的产生提供坚实、肥沃的土壤。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两张皮”的存在与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格格不入,也可以明白两张皮之间甚至同一张皮内学者间的相轻相贱以及形形色色的学术宗派的存在,如何与学术的健康发展背道而驰。这是学术社区不健全、学术文化缺失的后果。人性既可以变恶,也可以向善,学者也概莫能外。但是,健全的学术社区和健康的学术文化却可以止恶扬善,培养出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所需要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不但能够以饱满的热情去推动学科的研究,不断开创学科研究的新局面,还能够有效抵制来自社区外部的行政化、商业化、科研评价的实用化等对学术研究的不良影响。

可以说,建立健全的学术社区、建构健康的学术文化是当前我国语言学研究准备学派土壤的重要内容。消除两张皮之间的隔阂又是当务之急。如果两张皮的存在是历史产生的客观存在,那么如何摆正两张皮之间的关系则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意识和努力。

## 6 结束语

总之,虽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摆正上述 4 种关系却有助于我们向着这一目标迈出坚实的一步。有了自己的学派,中国的语言学研究才能真正走向世界,才能在国际语言学界取得话语权。

### 注释

按照 Losonsky (2006)的说法,洛克(John Locke)的著作

《人类理解研究》(1690)开启了两条语言研究路向。路向之一把语言看作一个受规则决定和制约的形式和生物系统,主张结合逻辑分析语言结构,着重研究语言结构背后的逻辑形式,代表人物为莱布尼茨、洪堡特、穆勒和弗雷格。路向之二把语言看作一种不受规则决定和制约的(因而也是科学无法研究的)人类活动,代表人物为孔狄亚克、后期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等(详见该书前言和第八章)。

国内语言学界(尤其是外语界的语言学研究)是否存在“以市场换理论”的现象呢?无论如何,目前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国内外语界的专业学术会议讨论的多半是国外学者提出来的研究问题。

从词源学来看,英语中“事实”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根是 facere,义为“已经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可参见玻姆(2004: 50 - 51; 160 - 161)。

### 参考文献

- 玻姆, D. 整体性与隐缠序 [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 陈心想. 知识的传承创新与知识分子社区 [J]. 读书, 2004(11).
- 佛 维. 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李 济. 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 [C].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0.
- 钱冠连. 以学派意识看汉语研究 [J]. 汉语学报, 2004(2).
- 钱冠连. 以学派意识看外语研究——学派问题上的心理障碍 [J]. 中国外语, 2007(1).
- 扬之水. 定名与相知 [J]. 读书, 2004(11).
- 叶斯柏森. 语法哲学 [M]. 北京:语文出版社, 1988.
- Collins, Randall *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 A Global Theory of Intellectual Change* [M]. Cambridge, Mass: Belkap / Harvard, 1998.
- Losonsky, Michael *Linguistic Turns in Modern Philosoph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收稿日期: 2008 - 09 - 29

【责任编辑 李洪儒】